船山挚友周士仪著述寻踪

柯愈春

在王夫之众多的友朋中，周士仪是一位与船山交往密切而至今湮没不显的人物。三百年来，周士仪的事迹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，他的著述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，究其原因大约有三：一是周士仪的著述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，有些著作佚而不存，有些著作存而稀见；二是王夫之自辑诗文止于康熙二十七年，七十岁之后数年所作后人未及补入，晚年与周士仪的交往诗文大都散佚，以至罗正钧纂《船山师友记》中，只摘录了《衡阳县志》等有关周士仪的寥寥数语；[①]三是周士仪只是崇祯年间的一名拔贡，在动乱的年代一直没有出仕；他的不少著作未能刻印传世，在变乱的战火中成了灰烬。船山学术，是直接影响他周围一群人的学术，也是涵盖多种科目的学术，更是清初整个时代的学术。时至今日，船山学术仍在社会中起着积极作用。对船山的挚友周士仪及其著述作些跟踪探寻，同时评述他与王夫之的一些学术交往，显得并不多余。

一、王夫之为周士仪撰墓志铭

作者在阅读清人诗文别集时，发现王夫之为他的同乡朋友周士仪写有一篇墓志，题为《靖文先生藿园周公墓志铭》(全文见后)。这是王夫之的一篇佚文，载于周士仪《周藿园集》。此集在乾隆间遭到禁毁，是侥幸存至今日的孤绝之本，王夫之的这篇佚文显得弥足珍贵。

这篇墓志铭题下原署："南岳遗老船山王夫之撰文，壬子孝廉鹤城黄五美书丹，同邑明经老庵邹定周篆额"。文后附注："不孝孤哀子周邠，承重孙洪业泣血勒石。时□□□□年□月谷旦。"文内的方框，皆原缺黑空。

王夫之的这篇佚文当作于康熙三十年，理由有二：一是周士仪卒于康熙三十年，比王夫之早逝一年，当士仪卒后不久，其孙命圭履霜百里，受叔父周邠委托，请求南岳遗老王夫之撰写；二是此文后附《易名议》姓名，同议名单中有"衡阳王夫之"，题后注明"重光协洽之岁"，此处阴阳纪岁中的辛未，即康熙三十年。王夫之卒于康熙三十一年，这篇墓志铭是他去世前夕所作。

周士仪字令公，号藿园。康熙三十年去世时，年已七十二岁。他是湖南人，但他是湖南什么地方的人，历来说法不一，他本人自署籍里也很不固定。康熙十二年，他为自己的诗集写序，题为《迈吟自识》。先称"湘中周士仪"，文中又谓"仆湘泽之癯也"，卷首题下则署"衡阳周士仪"。[②]衡阳在湘南，他却明说是湘东人。湘泽的范围更广，洞庭湖的周围都算得上。四年以后，他闯北走南，在《秋感自序》中又题称"语水寓人"，[③]在所著《史贯》题下则自署"古烝阳周士仪"。[④]至于其他人所写的传记序跋及禁书目录中，在他姓名的前面另加有"清泉"、"酃县"等字样。[⑤]其中原因何在？王夫之在《靖文先生藿园周公墓志铭》中，叙述周士仪的籍里说："先世自星渚迁酃邑，后自酃迁衡邑之东岸。"[⑥]衡邑即衡阳。原来他的先祖由江西迁到湖南酃县，后又由酃县移

居衡阳。康熙年间，他又在弟弟士俨的官署浙江语水栖息著书。乾隆二十一年分衡阳县，置清泉县，与衡阳县同城而治，所以乾隆间的奏疏都说周士仪是清泉人。清泉今属衡阳市。

在周士仪的生平中，有几件事为世所传诵。一是他在危难中勇敢救父。他父亲周祉在明末任常宁训导，罢官归里，途中被一群战败的士兵抓获捆绑，士仪泣求身代，那帮人受感动而将他父亲释放。后来在兵荒马乱中扶他父亲躲入深山，他父亲以求药不得而死。士仪突刃踏冰，扶榇治葬。二是他遍游燕齐吴越，广其所学，弘其所思，于是被聘纂修《衡阳府志》，十年始成。三是周士仪开创了清初湖南好学风气的先河。明末以来，湖南连年遭受战争劫难，湘潭、衡阳等地几乎沦为废墟，读书治学已无人过问。周士仪于艰难困苦之中，葺修败庐，教人好学。清初的湖南学术在全国领先而不衰落，实在开始于王夫之。而王夫之在周士仪墓志铭中却说："湖上先进之流风遥联不坠者，自先生昉。"清初湖南学术名扬全国，周士仪也是一位重要的创始人。

自明末至清初，周士仪在动荡的岁月中堵塞仕途而专事著述。他的著作繁富，王夫之在周士仪墓志铭中，说他著有《类丛》三十一卷、《史贯》十一卷、《明史野获》二十一卷及《碎琴》、《迈吟》、《杭游杂咏》、《秋感》诸集十余卷。《类丛》未见有书传世，内容已不可考。其余或存或佚，尚能窥其踪迹。

二、王夫之亟称深寓学术的《史贯》一书

《史贯》是一部评论中国历史人物及事件的专著。嘉庆《衡阳县志》周士仪传称，"其学寓于《史贯》一书，王夫之亟称之"。中华书局本《船山诗文集》及今传《船山遗书》，未见涉及《史贯》的诗文，当时王夫之有关诗文佚而未传。

王夫之比周士仪年长仅一岁，二人又是同乡，明亡后又都以遗民自居，于是切磋学问，意气相投。王夫之说他"茹其英不炫其荣"，又称他"以渊涵霞建之才，谢世荣以孤游"，这种看似平常的赞语，说明他们在交往中已杜绝了清初文人之间阿谀恭维的恶习，成为生死莫逆之交。周士仪把王夫之视为生平知己，临终遗嘱"匪船山弗志"的愿望正源于此⑦。王夫之将周士仪看作清初湖南学术的始祖，称誉所著《史贯》一书，亦基于此。

道光间徐鼒所撰《小腆纪传》，及近人编著的《明遗民录》、《明代千遗民诗咏》等书，都说《史贯》只有十卷，王夫之则称有十一卷。今有幸翻阅稀见传本《史贯》，原装四册，系康熙初年自刻之书。卷首有弟士俨所作序，署"康熙著雍敦牂"，阴阳纪岁中"著雍敦牂"即戊午，知此序作于康熙十七年，《史贯》当于此年所刻。士俨序中说："家仲兄令公，弱冠登贤书，自帖括而外，苦心诗古文词，而于史书载籍嗜之尤笃。亡何坐阅沧桑，数罹兵燹，牙签缃帙，尽付祖龙。然窜伏流离中，犹孜孜搜索，闻人有遗书，求必得之，手自抄录，几于匡鼎之客作而王充之游肆者，故其网罗日富，编次甚多。岁癸丑匹马都门，操管著《潞河志》，值道梗遂阻，南辕浮江入越，栖息语水官署，间出其意，作《史贯》十二卷。"据此可知：一是《史贯》写于癸丑旅京以后数年，即康熙十六年前后；二是此书乃周士仪南游浙江时寄居语水官署所作；三是原书应为十二卷，乃其弟士俨所刻。

今存《史贯》仅十一卷，卷一《春秋五传》、卷二《史记》、卷三《汉书》、卷四《后汉书》、卷五《季汉书》、卷六《晋书》、卷七《南史》、卷八《隋书》、卷九《唐书》、卷十《五代史》、卷十一《宋史新论》。相州许三礼序此书说："《史贯》一书，自春秋至宋元"，则所缺卷十二当论元史。元朝与清朝都是

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此卷应是精彩之笔，以有悖于清廷，可能最初就未付梓，也可能刻后惧祸抽出，未知世间尚有此书全本否。所谓《季汉书》，指明万历年间新安谢陛所著《季汉书》六十卷，此书“正统于汉，以篡窃斥魏吴”。此卷前有周士仪所撰小序，作于柔兆执徐（丙辰），即康熙十五年。

周士仪不以清廷年号纪岁，凡遇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统治，则时隐时现，多所指斥，《史贯》中的反清倾向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一点从诸家序言中也可看得清楚。卷首有“三楚督学使者义兴蒋永修”序，称士仪“读书穷理有素，其于书必求其可以贯者而后已，则《史贯》一书吾知其于理有合也”。序中又谓，“其作为文章，必有开拓万古、摧倒一切者”，“吾每有所得，则取《史贯》读之，亦犹古人以《汉书》下酒也”。继有“潭州同学弟王岱”序，谓士仪“读之有得，因著为论，论定而史之面目出，古人之行事亦出”。《史贯》与周士仪的其它著作一样，大都“写怀家国”，从这一点讲，作者的爱国激情是跃然纸上的。

面对清朝代明的事实，《史贯》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史事作了较为新颖的论述。如论秦穆公三良从葬事，提出“秦穆公起于西戎，进而与中夏争衡”，认为“三子者不得为良”。从而引伸论述说：“夫君子之事君也，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忼慨捐躯之际，正冠束带以死，安在临穴之惴惴哉？”这里论述了国家、民族处于存亡的紧要关头，知识分子应有生死与共、不惜捐躯的气慨。述评中话中有话，其意是说：明亡清兴之际，史可法、瞿式耜及从崇祯而死诸臣，都是“为社稷死”，而对洪承畴、钱谦益等降清人物，都视为“临穴惴惴”。《史贯》是一部借古讽今的著作。

然而，《史贯》并不如序者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，所谓“衡量古人，铢两不失”[⑧]。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明朝，君权开始动摇，老大的中华帝国需要革新。于是杨慎、李贽、钟惺等人顺应时代潮流而出，别树旗帜，鼓吹创新。《史贯》的作者对这些新鲜事物觉察不出，于是参加了清初学术界围攻进剿李贽等人的队伍。王岱序中说得比较隐晦：“明之留心史事者，邓潜谷之《函史》、钟退谷之《史说》、李温陵之《藏书》，皆有独见，发古人之未发。而不能无议者，见有偏执、论有踳驳，不数传而置之，此又读史而能贯之难也。”“黄叶村农”吴之振序中直接道出了其中的奥秘：“近代升庵、卓吾、伯敬之伦，家奉一书，人传一集，残膏剩馥，展转脱换，其流毒于后生晚进，宁有底极哉！”周士仪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对杨慎、李贽、钟惺等人所代表的新进思潮深感忧虑，于是如吴序所说，周士仪“怃然伤之，此《史贯》所由作也”。《史贯》中有意塞进肃除“流毒”的内容。所谓流毒，即钟惺《史说》、李贽《藏书》中反道统而主革新的观点。从这一点说，周士仪与清廷又是基本一致的，周士仪不能像王夫之那样比较彻底地与清廷对抗也在于此。

三、《明史野获》的被禁缘由及其它佚文

崇祯帝吊死煤山后，大明江山为来自北方的满族所得。当了“亡国奴”的知识分子，痛定思痛，不少人从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出发，搜集前明资料，撰写明史著作。周士仪的《明史野获》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产生的。这类著作几乎全部遭到清廷禁毁，《明史野获》也无法摆脱这种命运。乾隆四十四年，江西巡抚奏缴禁书目录中，内列：“《明史野获》，抄本，湖南周士仪，多有触碍。”[⑩]此书未见传世，到底哪些地方触碍清廷，今不得而知。张其淦所撰《明代千遗民诗咏》三编，称“《野获编》若干卷，（士仪）挟之以游”。这里所说《野获编》，当即《明史野获》。中华书局版

《王船山诗文集》中，录有王夫之佚文一篇，题为《明史野获序》，其中说："藿园周子，摭遗文、捃稗说，扩诹谘，叙一代之典，成《明纪野获》二十卷，示夫之而俾述其指。"此文录自嘉庆《衡阳县志》。而王夫之所撰周士仪墓志铭，作"《明史野获》二十一卷"。据此及郝硕奏疏，《明纪野获》当作《明史野获》。或《衡阳县志》转载书名有误，或所据乃初定书名，当以王夫之去世前夕所作墓志铭为较可信。此书二十卷亦当为二十一卷。郝硕奏中称此书为抄本，《明纪野获序》中有"是编之成，未能即问之世"，知此书在乾隆禁书前未曾付梓。

周士仪交游广泛，又是文章作手，应有杂文结集。今未见他有文集传世，墓志铭中所说的《类丛》，未悉是否文集或含有杂文。现存康熙间纂修《衡阳府志》，前后有两篇长序，都是周士仪亲笔手书。[11]前序考镜源流，别出心裁，畅叙设立诸类的理由，是一篇修志理论的有得之作。内设封域志、营建志、赋役志、学校志、风土志、秩官志、选举志、武备志、人物志、烈女志、艺文志、祥异志及外志，是修志实践的一种尝试。后序则记衡阳修志经过，洋洋洒洒，笔触清新。从乡邦文献的角度观察，两篇序文都堪称珍贵资料。此外，他有《鼓枻文集序》一篇。此文是他为仁和丁灏的集子所作，时在康熙三十年，正是他去世的那一年。周士仪卒于八月二十六日，此篇应是他的最后遗作。

四、孤本《周藿园集》是潜抒志向之作

周士仪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学者。所著诗集数种，王夫之称有十余卷，今所见仅五种，集各一卷，《碎琴集》则未见传世。今传诸集有《迈吟》、《南行句纪》、《杭游杂咏》、《西湖赋》、《秋感十二咏》，统称《周藿园集》，康熙间刻，是稀见孤本。

《迈吟》是作者自家乡赴北京所作，全诗不及百首。自识称"年五十足迹才及京华，则行迈之始也"，故取名《迈吟》，作于康熙十二年。首有李含春、新安黄元治及邵陵车万育诸序。李序说："其间名山大川有吟，故都遗迹有吟，幽人烈士之丰碑桓碣亦莫不有吟。或慷慨悲歌，不乏泣鬼惊风之慨。"周士仪在北京住了三年，与同乡车万育往来。康熙十六年出都赴浙江，辑所作诗为《南行句纪》，涂铨、吴之振为之序。

周士仪到杭州后，将咏西湖景物诸作，辑为《杭游杂咏》，左岘为之序。在杭州所作《西湖赋》单独成篇，前有小序述其本末。这些年的京旅杭游生活，培育了他热爱祖国山川的感情，"以证二十余年深山之所得，而益广其所弘传"。书中之书，书外之书，都成了他晚年治学的财富。
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周士仪与吕留良的关系。

雍正六年九月，发生过一起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反案，案情追及反清思想家吕留良。在罗织已故吕留良罪行时，雍正指他有"勾结叛乱"的弥天大罪，就是说吕留良与吴三桂的叛乱有联系。[13]在吴三桂叛乱期间，吕留良与衡阳周士仪有过来往。周士仪曾去浙江，即王夫之在《靖文先生藿园周公墓志铭》中所说，"采蘋花于江介，探神禹之穴"。吕留良有六首诗记载他们的往来。周士仪是否吴三桂联系滇浙的说客？周士仪是从北京去浙江的，吴之振为周士仪的《南行句纪》写序，称周康熙十三年后"在京三年，出都赴浙西"。周士仪《西湖赋自序》中说，"丁巳初夏访旧武林"，丁巳即康熙十六年。周士仪远离云南，为吴三桂做交通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曾静案发时，吕留良与周士仪早已去世，查无实证。但有一条可以肯定，雍正指吕留良"助虐为寇"，起码与周士仪没有关系。这一点在当时似已查清，否则周士仪会与吕留良一样，成为雍正

戮尸问罪的对象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，湖南巡抚刘墉奏缴禁毁书籍，将周士仪的《秋感诗》列目查禁，请旨销毁。理由是“查《秋云》结句，语涉感愤”。[14]《秋感诗》共十二首，从《秋月》写起，《秋云》是第二篇，余下为《秋汉》、《秋风》、《秋柳》、《秋草》、《秋蝉》、《秋萤》、《秋蝶》、《秋蛩》、《秋鸿》及《秋燕》诸篇。《秋云》全诗：

排空散绮漫盈盈，一片梨花梦里生。

出岫徘徊容有意，随风舒卷便多情。

几时送雨过巫峡，独自标霞过赤城。

苍白变更成底事，中天亏蔽失阴晴。

《秋感诗》的写作技巧平而无奇，但由于揉进了作者的寄托，于是引起了清廷书籍检查官老爷的警觉与注意。结句借自然变化写朝代陵替，且有骂“天”之意。这些诗作于康熙十六年，作者在自识中说，写诗的目的是，“藉彼昆虫草木之名，写我琐尾流离之怨”，以此“潜抒己志”。周士仪的朋友朱嘉澂对这类诗推崇备至，以为可与杜甫《秋兴》媲美，他在序言中甚至提出杜诗“似不能专美于前”。朱嘉澂对周士仪的思想情感深有所知，他将《秋感诗》与《史贯》联系起来，归结为“一切古今兴亡得失之故、出处正变之衡，都寓之于《史贯》一书”。这里的“兴亡”、“出处”，指的是明末遗民对故国的留恋及对新朝的抗衡，他们明知恢复之事已不可为，却倾其全力执意追求。《秋感诗》的其它篇章，如《秋萤》中的“映书莫乱旧云窠”.《秋蝶》中的“脉脉低徊忆旧枝”，抒发的也是这种关心民族存亡的爱国之情。

周士仪与王夫之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他们始终将自己的血液融于人民的爱国热情之中。

[附录]

靖文先生蕃园周公墓志铭

王夫之

蕃园先生以凛秋之旦，终于正寝。惊凶问之遄临，悼馀生之寡侣。衰草独摇，江鸿绝寄，颓龄自恤，方切衔悲。公孙命圭抱叔氏郊之命，于毁瘠百里履霜，请贞珉之志曰：“先子易箦之命曰，非船山弗志也。”以先生交遊半天下，定无华衮，而周爰四嘱，托之穹幽，故虽支馀息，不能以固陋辞。

先生姓周氏，讳士仪，字令公。蕃园，学者之称之也。先世自星渚迁鄠邑，后自鄠迁衡郡之东岸。曾祖考后山公道、祖考二水公希尧，考学博锡我公祉。

墨香续发于芸窗，彩戏嗣欢于兰砌，志先贤者再书特书，为湘皋最夙矣。学博公继配孙太宜人，而先生其仲子。姿抱英伟，顾瞻清炯，夙慧早成，静芡日吐，流目而千帙，服膺抽绪，而五岳摇笔，以是南诸侯之俎豆，与士友之鸡坛，争相挹也。

始贡于宾射之筵，继登于笙琴之醮，而公车方驾，故国旋□，众所凝望，以诗书之泽润濡天下，膏既屯矣。先生则视谢荣名如释重负，慨然曰：“吾将以自靖矣乎！家则堂传经于河朔，郑云叟啸咏于西峰，含古人劲草之心，而怡吾生养木之玩。敬吾业也，乐吾天也，抑可以无自贬也夫。”于时湖上连兵不解，数郡为墟，弦诵之声殆于绝响。先生则葺败庐，拾断简，内饬子弟，外奖英少，昭涤而涵濡之。百里荒郊，化为河西之石，室一庭茂，草蔚为谢，砌之琼之。盖湖上先进之流风遥联不坠者，自先生昉也。穷季讲讨，搜剔益弘，天化物情，千年万里，何所不入于先生之怀抱？而品节以著为成书，乃更瞿然自念曰：“吾静念而得之于一室者，不回朔乎寥廓之观，安知不为枌榆之抢乎！”

于是泛轻舟，策蹇卫，度楚塞，过夷门，上黄金之台，吊西山之松柏。已而栖迟潞水，延望海云。既则东循清济，问丝竹于鲁宫，南渡长淮，采蘋花于江介，探神禹之穴，汛皋亭之潮，期古人于旦暮，念天地之悠悠，以证二十余年深山之所得，而益广其所弘传。以是请修邑乘者相踵，而皆奉为彝典。简竹具存，读者可挹其深远矣。

凡所著《类丛》三十一卷、《史贯》十一卷、《明史野获》十一卷，《碎琴集》、《迈吟》、《杭遊杂咏》、《秋感》诸集，

又十余卷。海内缙绅士友,以许姚欧虞自命为儒宗领袖者,读其书,接其风度,靡不倾心跂足,纳交恐后。

而先生亦且老矣。归而一亩之宫,萧然自得,与子言孝,与弟言悌,与乡闾言和,蒸蒸油油,饮人以醇,酬得接音徽者,莫不以春风自喜。盖先生至性天植,立仁有本。侍养学博公,饥之下猝逢掠縶,求以身代。犷寇感而得释,扶掖入山,冒险以求药饵,远婴大故。正值焚杀盈野,而与弟中翰公士俨突白刃、踏曾冰,扶榇治丧,哀御飞鹗,爰成马鬣。既则抚育诸季,完其家室,赞其素业,咸令芡炤天逵。人叹聚星之美,皆因其恻悱不自已之诚。勿待缘饰,则君子乐其道,小人服其仁,非但在文采孔昭教言不倦间也。若其温恭之度,朗澈之襟,含贞自内而受物以和,不为过高难能之事,而皭然大白,不受涅缁。我不知古之行歌于栗里孤山者何如,意者其无能逾此也矣。呜呼,此蘉园之所以为蘉园者,遗命曰"匪船山弗志",尚谓此乎!

先生生以泰昌庚申年二月二十一日丑时。元配胡氏,继配欧阳氏。子三人:丰、郊、郜,丰、郜早卒。孙五人:洪业、命圭、命服、命甫、命申。曾孙□□□□□。以康熙辛未年八月二十六日午时无疾而逝。辆车方驾,会葬者慕德不忘,千心一轨,赠私谥曰靖文先生。安贞协彭泽之风操博雅,逾河汾之著作,仿古道以即人,心礼之所许也。兹阡为□□乡,首□趾□。铭曰:茹其英不炫其荣,含章以贞,驾言行遊。古飢与谋,八方千载,为我林丘。抱道以终,贻来者于无穷。有形者自返其宅,永栖息于此宫。

附注:此为王夫之佚文,见周士仪《周蘉园集》附录,康熙刻本。柯愈春抄录标点。

---

①《船山师友记》,罗正钧纂,岳麓书社 1982 年版,第 126 页。
②《迈吟》一卷,周士仪著,康熙间刻本。
③《秋感十二咏》一卷,周士仪著,康熙间刻本。
④《史贯》十二卷,存卷一至十一,周士仪著,康熙十七年自刻本。
⑤徐鼒《小腆纪传》卷五八"逸民"、孙静庵《明遗民录》卷十一、张其淦《明代千遗民诗咏》三编卷一、雷梦辰《清代各省禁书汇考》第 37 页等。
⑥周士仪《周蘉园集》附录,康熙间刻本。
⑦王夫之撰《靖文先生蘉园周公墓志铭》。
⑧周士仪《史贯》卷一《春秋五传》。
⑨周士俨《史贯序》。
⑩雷梦辰《清代各省禁书汇考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,第 95 页。
⑪《衡阳府志》二十三卷,张其勋修,周士仪纂,康熙间刻。
⑫雷梦辰《清代各省禁书汇考》,第 37 页。
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曾静档案。
⑭见注③。